

中美經濟持續糾葛六年的反思與啟示

文 |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國政基金會財經顧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三所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二所組長，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中美兩國自從2018年初爆發經濟爭端迄今，即將屆滿六年，此一期間雙方糾葛並未因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轉為緩和，反而從關稅戰更進一步延伸至科技戰、金融戰、資源戰。雖許多經濟學者、戰略專家始終將其癥結歸納為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甚至以稍早之前華為公布新款手機之後認為是兩國戰略勝負的觀察焦點；但午夜夢迴，從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探索，這些論述令人感覺我們的思維似乎是陷入歧路。

亦即從人類文明的發展朝向更高度的生產力、更先進的技術性過程來看，美國在面對中美兩國經濟爭端上，採取“逆道”而行戰略，嚴重干擾人類文明的前進與發展，其實其來有自。回顧二次戰後以來美國在產業布局上，乃是以“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透過“比較利益”將其產業分散到全球許多國家形塑全球供應鏈，進而藉此不斷累積市場利益。此一生產鏈模式，我們從二次戰後東亞日本開始，接着依據“雁行理論(Geese Theory)”延伸亞太四條小龍，1980年代之後再發展至中國，更進一步擴散至東協各國的脈絡，可以發現其端倪。

美國透過資本主義形塑全球產業結構

換句話說，這個以東亞為主體所形塑的全球產業結構，在基本架構上是美國透過“資本主義”體系形塑來的結果，其所聚焦的戰略方向，並非僅有充沛的勞工、低廉的土地成本、寬鬆的環保法令等生產要素之取得，而是包括具有成長潛力的新興市場之依賴，讓美國可以主導全球經濟資源的配置。不過，在此我們檢視此一發展過程卻又發現，1980年代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並未完全遵循美國所精心規劃的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崛起、社會運動、民主政治改革等路徑，而是依據其國情實際需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加上中國經濟體量即為龐大，使得美國更加難以主導其整體發展型態。